

从逻辑构想到现实生成： 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

□ 元晋秋 狄瑞波

内容提要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一高度凝练的关于社会主义“新纪元”的表述中，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这一思想经过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逻辑构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生成”、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和深化三个阶段；基于这一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未来社会的特征，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阐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贯穿其理论探索过程始终的一根红线。

关键词 个体 共同体 历史辩证法

作者元晋秋，哲学博士，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硕士生导师；（南宁 530004）
通讯作者狄瑞波，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讲师。（杭州 311500）

DOI:10.14167/j.zjss.2021.04.012

1894年1月3日，意大利人朱泽培·卡内帕致信恩格斯，请求他为将要在日内瓦出版的《新纪元》创刊号题词，恩格斯回信道：“除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笔者注），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②。在这一高度凝练的关于社会主义“新纪元”的表述中，蕴含着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本文试图在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中再现这一思想，以彰显其对马克思整个理论探索过程的价值和意义。

一、从“异化”到“复归”：

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关系的逻辑构想

从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看，其个体与共同体

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最初表述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入这一文献的具体语境，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马克思对当时的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并“没有说明这个事实”，而只是“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把这些公式当做规律”^③。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我们不要像国民经济学家那样，当他想说明什么的时候，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我们且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④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马克思首先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产品、劳动过程同工人相对立的事实——马克思将此视为“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进而试图从“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⑤，在此过程中向我们展示了其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法思想的雏形：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人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批准号：17CKS005）。

首先,人是“类存在物”^⑥,其“类特性”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⑦。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其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人都把“类”当做自己的对象(包括他自身的类以及其他物的类);其二,“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⑧。从人是“类存在物”出发,马克思提出了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精神的无机界”等观点。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这种“类特性”是在人同其他动物的比较中显现出来的。马克思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要靠自然界生活,但是,“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于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⑨——这种“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蕴含着“自由”的特征,如马克思所说,“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⑩等。由此,“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成为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

其次,异化劳动使“个体”与“类”相对立。如前所述,人是“类存在物”,自然界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然而“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是:其一,工人的劳动产品是一种对他来说的异己的存在物,劳动产品与工人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同时也是工人对感性的外部世界、对自然界的关系;其二,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反对自身的活动,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劳动过程与工人之间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马克思将具有上述规定性的工人劳动称为“异化劳动”,并指出:“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2)使人本身,使他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因此,异化劳动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⑪。具体而言:“第一,它使类生活和个人生活异化;第二,它把抽象形式的个人生活变成同样是抽象形式和异化形式的类生活的目的”^⑫——此即“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对此,马克思

进一步补充说:“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这一命题,说的是一个人同他人相异化,以及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⑬。换言之,异化劳动不仅使“个体”与“类”相对立,而且使每一个体都同他人相对立。

最后,共产主义是“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⑭。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并没有说明这个事实,马克思则通过对“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的考察指出:“尽管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但确切地说,它是外化劳动的后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⑮由此,在马克思看来,被国民经济学家当做理论出发点的私有财产并不是既成的天然事实,而是历史的产物,是劳动的结果,而“异化劳动”构成这种私有财产的“直接原因”^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讨论了社会从私有财产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他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⑰,而“历史的全部运动”就是“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⑱。由此,他提出: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是“人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对象化和自我确证”、“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⑲。

综上,通过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述了一种关于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法思想的雏形:其起点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即“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其过程是导致“个体”与“类”相对立的异化劳动的发展;其走向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在这里,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源于同其他动物的比较,作为历史过程的异化劳动源于当前国民经济的事实,作为历史走向的共产主义则源于“异化-复归”的抽象逻辑。在此过程中,个体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被表述为“个体”与“类”的辩证关系,至于“类”是什么,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阐释(当时的马克思曾致信费尔巴哈:这里的“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这一概念,那是什么呢?”^⑳);而导致“个体”与“类”相对立的异化劳

动的发生机制和扬弃过程,马克思在这里也并没有详细说明。由此,在这种“异化-复归”的抽象逻辑中所呈现出的“个体”与“类”的关系,仅仅是一种关于个体与共同体辩证关系的逻辑构想。在马克思之后的思想探索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这一逻辑过程的具体化。

二、从历史的“现实前提”出发: 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关系的现实生成

对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的考察表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形成时期的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学说的影响(其所使用的“类”概念就直接来源于费尔巴哈)。通过此后对费尔巴哈人本学的研究和反思,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②,而是“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由此,人的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在此基础上,他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基于对人的这种独特理解,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深入现实社会历史进程,并在此过程中展开对个体与共同体辩证关系的具体分析。这种分析首先从明确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开始。

何谓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马克思认为,构成人类历史“现实前提”的是“一些现实的个人”以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是“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事实^④。具体而言,它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1. 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人们要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等物质生活资料,因此,马克思将生产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活动称为“第一个历史活动”和“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⑤;2. 人们的“新的需要的产生”活动,即“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马克思将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活动也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⑥;3. 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马克思认为,这些生产的个人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它由人们的“需要和生产方式”所决定,并随着“需

要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⑦。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强调:“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⑧

马克思对人类历史“现实前提”的上述分析表明,其对人类历史的考察并非基于人类“个体”,而是由“个体”基于一定的物质联系(它由人们的“需要和生产方式”所决定,并随着“需要和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采取新的形式”)所形成的“共同体”。在这种考察过程中,马克思描述了“共同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三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是人类“个体”基于“家庭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家庭关系”是一开始就进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它指的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夫妻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家庭关系”起初是唯一的生产关系,但随着生产的发展,“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⑨。马克思将这种“共同体”称为“自然形成的共同体”^⑩,包括自然形成的家庭和扩大为氏族的家庭、部落以及由氏族之间的冲突及融合而形成的各种形式的公社。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一个“个体”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人们之间的分工仅限于家庭中现有的自然分工及这种分工的进一步扩大,“个体”通过这种“家庭关系”或扩大了“家庭关系”而结合在一起。在此过程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还没有出现利益的分化,“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做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做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⑪。换言之,在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之间是一种直接同一的关系。

第二种形式是人类“个体”基于分工、所有制和财产关系所形成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⑫。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后,分工

才成为真正的分工,这种分工不仅使人们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②通过不同的“个体”来承担成为可能,而且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成为现实;与此同时,这种分工还带来了劳动产品的不平等分配,进而产生了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由此出现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这种“共同利益”不仅是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普遍的东西”,它“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互相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③。在此过程中,由于每个“个体”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利益,所以这种“共同利益”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和“虚幻的”东西。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这种分工所形成的利益联系、特别是由这种分工所决定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共同利益”开始以国家的形式出现。马克思将这种形式的“共同体”称为“虚幻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或“冒充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直接生产的“个体”与“共同体”之间表现为一种对立的关系。

第三种形式是人类“个体”基于个人的自由联合所形成的“共同体”。现实历史进程表明,生产力的发展与分工的发展同步进行。而在一定的社会分工条件下,每一个“个体”都被限定在一个特殊的范围内活动,受这种分工所制约的人类“个体”的共同活动形成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④,这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这种力量对这些人来说却是一种异己的和不受他们支配的力量,以至于成为一种限制其自由的力量。马克思说,这种状况“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就是“异化”,而这种“异化”的消除需要具备两个实际的前提:其一,要使这种“异化”成为革命的对象,就需要“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成‘没有财产的’人;其二,这些“个人”同时又与“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在此过程中,马克思特别强调这两个前提的生成条件,即“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这是因为:只有在这一条件的基础上,“争夺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才不会死灰复燃,“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⑤。随着这种生产力的提高和人们的普遍交往的形成,社会中产生了这样一个阶级:它“构成了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它承担着这个社会的“一切重负”而“被排斥于社会之

外”,因而“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意识”^⑥。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以及与此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⑦,这种由个人力量通过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将被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自觉地控制和驾驭。马克思将这种基于个人的自由联合所形成的“共同体”称为“真正的共同体”^⑧,并指出,在这种“真正的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⑨,“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⑩。因此,在这种“共同体”中,“个体”与“共同体”达到了一种新的同一关系。

由此,从人类历史的“现实前提”出发,马克思不再强调“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类特性”,而是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中来考察人的自由。一方面,他指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另一方面,他认为,“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⑪。在此过程中,基于对现代生产方式的考察,马克思提出并初步分析了未来“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条件及其特征,为其后《共产党宣言》的创作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其中关于未来社会的特征的描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⑫),正是这一思想最直接的体现。

三、政治经济学批判:

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关系的运用和深化

马克思对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关系的思考始于对当时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性考察,后又返回到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并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深化和发展。

首先,基于对个体与共同体辩证关系的上述认识,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开篇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

的个人”,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④。在马克思看来,恰恰在这一“出发点”上,斯密和李嘉图等人暴露出了他们的“局限”——他们想象和虚构出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所基于的其实是“18世纪的个人”的“假象”,这种“18世纪的个人”并不是历史的起点,而是历史的结果。马克思认为,造成斯密和李嘉图的这种“局限”的原因是其“历史基础”的缺失^⑤,而这种缺失的“历史基础”,正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建构过程中所阐述的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写道:“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和“外在的必然性”。与此同时,他特别指出:“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恰恰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⑥在阐明这种“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马克思做了如下工作:

第一,深入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⑦。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分别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三种所有制形式进行了考察。在他看来,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是“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是人们占有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每一单个的人只有作为共同体的“一个肢体”和“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是“所有者或占有者”^⑧;人们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属于共同体,既表现在贡赋等形式上,也表现在颂扬统一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⑨。“古代的所有制形式”是第二种形式,它也以共同体为“第一个前提”^⑩。在这种形式中,单个人的财产是同公社财产分开的个人财产,但个人仍然是共同体的成员,公社(作为国家)是这些个人“对抗外界的联合”和他们的“保障”^⑪;人们的剩余劳动时间属于公社、属于战争等事业。“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是第三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公社本身作为语言、血缘等共同体仍然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它只存在于“为着共同目的而举行的实际集会中”,因而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⑫;在这种形式中,每一单个家庭本身单独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共同体内部开始出现

阶级分裂的征兆。马克思认为,在上述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被作为前提的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地或又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已经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⑬。

第二,进一步概括了历史进程中人类个体形成共同体所基于的三种关系。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概括为“人的依赖关系”^⑭,这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它以“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为基础。在这种关系下,“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分工与交换的发展,这种“人的依赖关系”逐步为“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形成“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里的“物”是人们之间的物化的社会关系、物化的交换价值,其独立的存在形式就是货币。在这种“物的依赖关系”下,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出个人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⑮。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预言,随着社会生产的充分发展和“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体系的“崩溃”,人们之间将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个人成为“社会个人”^⑯,个人关系作为他们共同的关系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控制,由此形成“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⑰。

第三,全面系统地开启了对这一“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解析。马克思将“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的时代所形成的“孤立个人的观点”,看作是对日益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⑱,“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⑲。实际上,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阐明这一“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在此前已有多次尝试,但这一工作全面而系统地开启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这部文献当中,这一“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被定位为“物的依赖关系”,表现为物化的交换价值和货币,而货币则表现为“现实的共同体”^⑳。这一状况是如何造成的呢?马克思说:“由于产品成为商品”^㉑。具体而言,当产品成为商品,商品在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产品,一方面作为交换

价值——交换价值在这里于是取得了一个同产品相脱离的存在形式，而货币就是同商品本身相脱离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同其他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正是从此处出发，马克思开启了对这一“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全面而系统地政治经济学解析。在这一研究道路上，马克思阐明了这一社会关系的形成、发展与实质，并基于他所揭示出的这一社会关系下的一系列经济运行规律，指出了这一社会关系的自我否定趋势及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的现实条件的生成——这些理论成果最终被系统地表述于《资本论》中。

其次，马克思将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关系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成果，这就是由他首先提出并“批判地证明的”^⑥劳动二重性学说——其形成肇始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成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具体而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交换价值）根源于人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而人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则源于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关系中人所具有的二重性（即人的个体性和社会性），对此，马克思说，“不同的使用价值是不同个人的活动的产物，也就是个性不同的劳动的结果”，而生产价值的抽象劳动则是一种“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⑦，所以它“并不表现为不同主体的劳动，相反地，不同的劳动者个人倒表现为这种劳动的简单器官”^⑧。这一理论成果被马克思认为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⑨和“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⑩，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奠基的意义。

四、《资本论》：阐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的政治经济学

在《共产党宣言》中，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特征的“联合体”的建立是被这样叙述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⑪。随着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起来。在此过程中，（1）人们之间原有的各种社会关系被斩断，劳动者成为雇佣劳动者，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人们之间的关系成为纯粹的金钱关系；（2）伴随资产阶级

在其统治过程中创造出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3）“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⑫，一方面是人数的增加、联合的扩大和力量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其生存条件的不断恶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现存制度的反抗的增长。在此基础之上，无产阶级“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并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⑬，由此形成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

以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上述过程进行了严格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其一，在追问价值增殖何以发生的过程中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条件及其本质；其二，在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考察的过程中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其三，基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的经济运动规律，阐明了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条件——

首先，由抽象劳动形成的价值实体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计量，通过交换价值（特别是作为物化的交换价值的货币）来表现。商品在交换过程中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然而在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中，遵循等价交换原则的流通过程出现了所谓的“总公式的矛盾”^⑭，价值发生了增值。究其原因，是因为货币的所有者在市场上购买到了一种特殊的商品——即劳动力商品，其使用价值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对它的使用本身就是价值的创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要使货币占有者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就必须具备各种条件”^⑮：其一，劳动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自由地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二，劳动者没有其他商品可以出卖，因而只能出卖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既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条件，由此而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任何一种社会生产中，总是能够区分出劳动的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产品直接由生产者及其家属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即始终是剩余劳动的那个部分的产品,总是用来满足一般的社会需要”^①。实际上,剩余劳动作为“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的生产”不仅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它还是构筑起人们之间现实社会关系的核心要件——因为不同的生产方式所标注出的正是人们的剩余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同的占有、分配、使用和再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在于其通过占有剩余价值的方式榨取剩余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详细考察,指出了其榨取剩余劳动的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由此揭开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

再次,“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明,以资本运动为主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以生产剩余价值为其绝对规律。具体而言,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和竞争所产生的外在压力的共同作用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要最大限度地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要将生产出的剩余价值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进行资本积累。在此过程中,通过对三大“自然力”的开发利用,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社会化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巨大的物质财富;于此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一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它还是一个广大劳动者的“与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④过程——由劳动者创造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为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并将其最大限度地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资本家需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的工资;资本积累的持续进行为资本有机构成提供了条件,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引发了资本主义社会“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⑤,由此使劳动者之间的生存竞争加剧、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其结果如恩格斯所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从而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⑥在此基础上,《资本论》中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⑦:当资本积累及其与之相适应的贫困积累达到顶点,资本主义的“外壳”

就会炸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取而代之的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时代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⑧。

最后,《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同时,阐明了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为特征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生成条件。首先是物质条件。马克思说:“发展社会劳动的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创造着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⑨具体而言:1.由资本增殖运动所推动的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直接带来物质生活资料的极大丰富;2.机器的使用使“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劳动者可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3.社会生产的发展使人们的剩余劳动时间逐步增多;4.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塑造出了一个生产和需要的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为人的丰富“个性”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等等。其次是主体条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不仅塑造出了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使他们成为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主体力量,而且还塑造出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包括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普遍的勤劳、先进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等。因此,在通过“剥夺剥夺者”的社会革命实现生产资料所有权变更之后,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能够“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化”,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劳动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工作日)极大地缩短从而剩余劳动时间(在这里成为自由时间)延长,剩余劳动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⑩和“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挥”^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此意义上,以“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最终目的”的《资本论》又成为阐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的政治经济学。

结 语

从马克思思想演进历程看,其理论探索过程始终伴随着他对个体与共同体历史辩证关系的思

考——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经历了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逻辑构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现实生成”、再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和深化三个阶段；基于这一思想，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未来社会的特征、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阐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何以可能的政治经济学。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关于个体与共同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不仅是贯穿其理论探索过程始终的一根红线，它还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一个重要视角，为我们走进马克思的思想世界提供了一个基本线索。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3、591、32、38、53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5、156、160、161、162、

161、162、162~163、161、162、164、185、166、167、182、186、185、530、501、519、531、531~532、533、532、532、584、534、535、536、538、538、542、541、571、573、571、571页。

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页。

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2、5、5~6、6、122、123~124、125、126、127、134、131、196、52、56、196、52、5、42页。

㊻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286页。

㊽㊾㊿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54~55、182、195、272、10、743、725、872、871页。

⑪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1、423页。

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1页。

⑭⑮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93~994、288、929页。

⑰《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1页。

责任编辑 戴道昆

(上接第154页)

⑳房东波、程显英：《我国大学国际化战略制定与执行研究——以10所国内大学为例》，《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1期。

㉑陈洪捷：《学术创新与大学的科层制管理》，《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3期。

㉒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8年5月3日。

㉓ Knight Jane: Upd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 Definition

[J].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2003, (33).

㉔ Van de Wende 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Policies for Internationalisation and Those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General. In: T. Kalverman and M. Vander Wende (ed.) *National Policies for the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M]. Stockholm: Hogskoleverket Studies, National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 1997:10-31.

责任编辑 余越

Property will simultaneously rely on economic and super-economic factors to construct itself during its historical form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 determines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these factors, which also determines the dominant structure of Property. Grasping these contents will enable us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arx's thoughts on Property and provide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and premise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 words: property; economic domination; super-economic domination; Brenner; means of subsistence

**From Logical Conception to Realistic Generating:
Marx's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108)

Yuan Jinqiu¹, Di Ruibo²

(1.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2.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Tonglu 311508*)

Abstract: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the condition for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all". This concise description of a "new era" of socialism embraces Marx's historical dialectics about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which goes through three stages. It is no more than a logical conception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then becomes a reality in *German Ideology* and finally is widely applied and deepened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about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Marx reveal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ture society in hi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evelops a scientific theory, the two-fold character of the labor,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ics and hence founds political economics that clarifies how the free development of each is possible. Marx's historical dialectics about individuals and the community serve as a red thread that runs through hi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Key words: individual; community; historical dialectics

On the Cultural Essence of Yue Commerce, the Ancestor of Zhejiang Merchants (116)

Pan Chengyu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Abstract: To 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Zhejiang merchants, we should regard the commercial culture of Yue as the ancestor of Zhejiang merchants. In the lat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main body of business in the state of Yue was divided. Besides the official merchants, there were free merchants, that was, private merchants. While attaching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state-owned market to prevent business fraud, the state of Yue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wisdom of private businessmen, practiced the theory of "increasing wealth" including the theory of "valuing business" and the theory of "living business". In the fundamental nature, the business of Yue State organized and launched the "private business" by the honest "official business", which realized the rapid growth of national wealth; it was a big business between the various princes in the same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rather than just facing the people of their own countries; Yue's "national wealth" had been accompanied by "family wealth", which was a relatively ideal state of national wealth.

Key words: the ancestor of Zhejiang merchants; the business of Yue State; government business; private business

Art of Lighting Design in Cao Yu's Drama and Its Implication to Dramatic Scenes (123)

Liu Jiasi¹, Liu Guiping²

(1. *Zhejiang Yuexiu University, Shaoxing 312000*; 2. *Ningbo Polytechnic College, Ningbo 315800*)

Abstract: Cao Yu's theatrical production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use of light that works as a way and art to create dramatic scenes. The use of light in his drama is very real and fine both in an open scene and a closed scene, although the use of light in an open scene is its main creation. Cao Yu is good at grasping the effective levels of light and color, bright and dark, strong and weak, from the spotlight to natural light, being flexible of combin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forms. He is also gifted at optimizing the effect of drama and indicating his distinctive aesthetic pursuit through the contrasting combination of changing light tones and light strengths. Cao Yu always starts from the artistic performance and rehearsal requirements of the whole play to carry out light color configurations, makes full use of the dynamic change of light color, brightness, tone adjustment to highlight the ideological implication, deepen the character